

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

ICS BULLETIN

二〇一五年 第二期

中國文化研究七十年

汪德邁

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訪問學人、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院通訊院士、法國遠東學院前院長

汪德邁 1928 年生於法國北省。巴黎東方語言學校畢業，獲中文系（1948）、越南語系（1950）證書，後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1951）、文學博士（1975）。曾訪學於日本京都大學（1959–1961，1964–1965）、香港大學（1961–1964）等。先後任越南中學教師（西貢：1951–1954，河內：1955–1958），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1956–1966），艾克斯—馬賽大學副教授（1966–1973），巴黎第七大學副教授（1973–1978），巴黎高等學院儒家歷史研究導學教授（1979–1993），東京法日會館法國館長（1981–1984），法國遠東學院院長（1989–1993）等。為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院通訊院士，著有《新漢文化圈》、《王道》等學術巨著，並於 1980 年獲得被譽為漢學界諾貝爾獎的「儒蓮獎」。

汪德邁教授於文中回顧自身過往七十年的中國文化研究經歷。他從如何對中國文化產生強烈興趣談起，介紹自身的教育經歷及研究取向，並回顧法國漢學的發展，表達了對中國研究未來發展的殷切期盼。

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不是來自他人的影響，而是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讀了喬治·馮·德·格貝勒茨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 的一本中文語法書，便立即對中國語言產生了極大興趣。我發現中文不僅與我的母語法文有很大的差異，與我在中學時期學過的其它外國語言，拉丁文、希臘文和德文也不相同。因此，我對中國的興趣最初是關於中國語言的。廣泛而言，是對語言所折射的中國文化感興趣。我讀完這本中文語法書以後，馬上拜託我的一位朋友介紹我認識他的中國朋友陳榮升，陳榮升便成了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師，那是一九四五年

六月。後來陳榮升在歐洲加入了二戰法國抵抗運動對抗納粹，在中法客運交通恢復後，陳便返回中國投身中國共產革命。離開法國之前，他介紹我認識了他的朋友李志華（法文版《紅樓夢》的譯者），李志華從此成了我的第二位中文老師，我的中文名字汪德邁便是李志華為我取的。接著同年十月，我進入巴黎法國立東方語言學校，開始跟隨保羅·戴密微教授學習中文。

那年我十八歲，還沒結婚。我的專業並不是中文。我在巴黎大學主修哲學與法律，但我對律師這一行業不感興趣，我關心的是法律的哲學。記得在巴黎大學的時候，我的其中一位教授是現象學專家讓·瓦爾。在一場考試中，瓦爾教授問了我一個問題，我回答時提到了馬賽勒·葛蘭言對中國哲學的評價，但瓦爾教授果斷地打斷了我，並說他對中國哲學沒有興趣。這讓我很驚訝，偉大的思想家也有其狹隘的一面。

一九五零年我結婚，我需要找一份工作，但我仍希望能到遠東去。當時的情況不允許我到中國，而法國政府正在招募人員到越南。越南文化有很大程度的漢化，我的妻子也是在西貢出生的華僑，西貢似乎成為我最理想的去處。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我在西貢工作了三年，並於一九五五到一九五八年間在河內工作了兩年半。在這之間，我還回到巴黎大學讀了一個學期哲學。讀完後本打算回到西貢，但那時日內瓦條約簽訂，時勢變化。法國遠東學院在越南的主要中心在河內，我因此決定自願到其他人都不願意去的河內法語中學教書。後來證明我的決定是對的。我到河內後很快便在法國遠東學院中獲得一職。去到河內三個月後，當地新成立的共產黨政府廢除了法語教學，我無事可做。恰逢法國遠東學院需要替換博物館館長一職，我便進入博物館工作，隨後還參與到法國遠東學院的中國研究項目中。

一九五七年，我還在越南，我的朋友蔣信邀請我到北京外交學院與他一起教法文。我答應了，並收到外交學院的教授聘書。然而，當我向法國遠東學院院長提出把我送到北京的請求時，他以中法沒有建交為由拒絕了。我仍然堅持我的請求，最後獲得河內法國外事處代表的批准，但前提是我必須等到有人來代替我的職位之後才能離開。幾個月後，接替我的新職員雷維安才來到河內，而在這期間，在我準備出發前往中國的一九五八年二月，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巨大變化。駐河內中國大使建議我取消合同，我因此取消了北京之行，並在五月回到巴黎，之後被遣派到東京，再到後來的香港。

一九六零年代我分別在日本和香港停留，我的學術生涯也因此展開。一九六六年我回到法國巴黎，繼續為法國遠東學院工作，被指派為饒宗頤的助理。當時饒宗頤受邀到法國協助戴密微教授進行敦煌資料研究。一九六七年我在法國南部的艾克斯—馬賽大學擔任教職，並負責指導新成立的中文系。



一九七三年我從艾克斯－馬賽大學轉入巴黎第七大學，並在一九七八年從巴黎第七大學轉到巴黎高等學院。在巴黎高等學院任教期間，我同時擔任東京法日會館法國館長（1981－1984），法國遠東學院院長（1989－1993）。一九九三年我退休，法國遠東學院院長一職懸空。我推薦饒宗頤繼任，饒公同意代任三個月，再次住在我家。

我在法國求學時並沒有修讀語言學，反而是後來對中文產生興趣才開始接觸和熟悉語言學研究。我僅僅把語言學看作研究中文特性的一個工具。但許多研究東方語言的學者恰恰相反，他們學習中文是為了把語言學理論套用到中文裡。因此，許多語言學家因為其本身對語言的預設而無法透過甲骨文認識中國象形文字的真正特徵。他們僅關注口語，也不認為象形文字會存在於表意形式以外的文字形式。王力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中國語言學家，但他也受到同樣的影響。他的語言學老師是法國偉大的語言學家安東尼·梅耶。梅耶是研究印歐語的權威專家，但他一點也不了解中文。王力所受的法國語言學熏陶持續影響其他的中國語言學家。我本身沒有受到這種影響。我的研究更加貼近符號學、哲學以及語言學的方法。饒宗頤的研究則是純文獻學的方法。我嘗試從全球視野來看問題，文獻學家關注的是精確的特定數據。

年輕時，我還希望能到香港與真正生活在中國的人們用中文交流。我認為要真正理解中國的思想，首先必須與中國人進行真正的交流。一九四零年代後期，謝和耐和我在語言學校一起修讀中文課程，但他從來不說中文。他僅對文本感興趣。我非常欽佩他在文獻學的成就，卻不贊同他認為「鸚鵡才需要說話」的觀點。戴密微教授很喜歡說中文，但當我提出到香港練習中文口語的時候，他並不贊同。他認為香港是個商業社會，如果要學習中國文化，日本是更好的選擇。因此我被遣派到京都。我在日本果然有機會進入幾位偉大漢學家的課堂，如吉川辛次郎、小川環樹和內田智雄。他們都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這更加堅定我去香港的決心。後來戴密微與饒宗頤成為朋友，我最終得以成行。

大學時我起初對哲學感興趣，但我一直對中國思想保持好奇。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如此不同，這本身就是一個哲學問題。為了解答這一問題，我不斷深入地追尋中國文化的根源。因為我本身的法學背景，我對中國思想的探究是從法家開始。我意識到韓非子的哲學實際上根植於諸子哲學，而諸子哲學的核心則是儒家思想。後來我又發現，要理解孔子，必須理解儒家思想背後的根基。再後來我終於接觸到中國推測思想的起源，那就是甲骨文所記載的占卜學說。感謝戴密微介紹我到香港跟隨饒宗頤學習甲骨文，讓我有機會認識到甲骨文的重要性。我更有機會進入饒宗頤的課堂，學習《文心雕龍》。這不僅是中國修辭與詩歌的經典之作，更是一部中國哲學經典。另外，饒公還在他家中為我單獨授課，講解《說文解字》。我得以接受古文字學的訓練。兩年以後，我終於能夠就饒宗頤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寫出一篇小結，並於一九六五年發表在《法國漢學研究通訊》上。

我本身沒有專注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我認為這樣的研究只有中國學者能勝任。一般來說，中國研究的文獻考察領域必須先由中國學者開創，西方學者才能進行後續研究。我記得我曾就法文版《國語》翻譯中的一個問題請教饒宗頤，他認為西方學者翻譯這部中國經典為時過早，因為中國學者自己也沒有真正破解這一經典。正是這個原因，我研究考察中國學者對甲骨文的研究，而不是甲骨文本身。我關注中文表意文字詞源學，這是中國文化的基礎。

饒宗頤教我《說文解字》，總是讓我到他家裡去，每週兩三小時。他先給我看書中的幾段文字，然後再解釋，並就每一個字詞詳細地講解。我也由此開始對詞源學產生興趣。《說文解字》本身有不少錯誤，但這是因為

成書時沒有適合的參考來源。在同時期公元十一世紀的歐洲，根本不存在可以相提並論的研究作品。

饒宗頤百科全書式的知識以及他的勤奮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最讓我欽佩的還是他的生活方式。他身上展示一種真正的學者風範，全神貫注投入到研究工作中。當時香港大學及西方漢學界幾乎沒有人發覺他的天賦，戴密微是唯一例外，他讓我也見識到饒宗頤的才華。他的天賦最終在香港中文大學得到認可和發揮。在中國大陸，由於他父親被認為是潮州資產階級的代表，這一政治出身也讓他不受重視。但他完全沒有受到這些外界評價的影響，也絲毫不在乎。他把全部時間都投入到研究中，對外界的繁雜不為所動，他的生活極為簡樸。

一九六零年代末我在法國開始教授中文的時候，法國的漢學正處於一個變化的時期。一九四零年代，整個法國僅有三門中文課程，分別由巴黎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巴黎高等學院和法蘭西公學院開設，大學沒有開設任何中文課程。直到一九六零年代，法國的大學才逐漸開設中文課程。一九七零年代的法國僅有三位有博士學位的漢學家，吳德明是第一個，謝和耐是第二個，我是第三個。隨著越來越多大學開設各種中文課程，中國研究的博士生也越來越多。這些新一代的學生都能說一口漂亮的中文，但很少能夠閱讀文言文。

從耶穌會士開始，法國漢學有很長的歷史傳統。在耶穌會創立以前，中世紀的法國並沒有學者對拉丁語，希臘語及希伯來語以外的語言感興趣。文藝復興時期，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創立法蘭西公學院，鼓勵學者研究阿拉伯語。法國與奧特曼王朝的關係密切，阿拉伯語由此獲得重要地位。幾年後，耶穌會於一五四一年成立，發起人依納爵·羅耀拉和他的朋友都在巴黎大學學習，成立儀式在巴黎舉行。他們都受到一股對非歐洲文化的包容與開放精神的影響，決心開始對歐洲以外沒有受到清教影響的人們進行傳道，反對清教教義。耶穌會的歷史是法國歷史的一部分，耶穌所帶動的西方漢學，也是法國歷史的一部分。自此以後，其它西方國家也開始發展漢學，但那都是十九世紀以後的事情了。

中國傳統文化是過去學術研究的重點，現代學術研究重心則轉向當代中國。我同意理解當代中國的重要性，正如我希望開口說中文來避免一種「教條式」的漢學研究一樣，僅僅研究傳統中國是不夠的。我也很感激饒宗頤帶領我接觸活生生的香港文化。但另一方面，我對現在學界對傳統中國文化研究的缺乏感到遺憾。我認為，這正是目前西方學者僅關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而徹底忽略中國文化的原因所在。另外，現在到法國留學的多數中國學生對中國文化所知甚少，我對此感到驚訝。

儒學研究經歷的變化最大。文化大革命以來儒學被官方政治話語完全摒棄，現在儒家思想又重新被倡導。當然這樣的政治性倡導難以避免有狹隘甚至虛偽之處，但我認為這種虛偽的倡導要比文革對儒家的摧毀好一些。借用十七世紀法國著名的道德家弗朗索瓦·德·拉羅什富科的話，即是：「虛偽是惡對善的敬意」。

作為饒宗頤訪問學者在香港訪學的一個月，很高興能夠與對我的漢學研究有興趣的人們見面交流。要接受一個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闡釋，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也許有些困難。但相較於與歐洲中心視角的西方學者討論先驗的中國文化，我更樂意與中國人交流，我也喜歡批評的聲音。語言學家們質疑我對中國象形文字的闡釋，與他們的辯論也讓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國文化。另外，香港大學的饒宗頤學術館也讓我印象深刻，我記得過去這個中心還是很小的，現在已經發展得這麼好。我很驚訝香港能夠為饒宗頤設立一個如此了不起的圖書館。在法國，我們從來沒有為了與饒宗頤同樣重要的知識分子或藝術家成立類似的機構，可見中國人對文化的尊敬。

香港的確是以經濟為重心的城市，但卻仍然保有文化的空間。我第一次到香港的時候，還是英國統治時期，全港只有一所英語大學。現在香港已經有九所大學，其中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系能夠與歐美頂級大學的文學系相媲美。

回顧過往七十年與遠東文化緊密接觸，我希望，中國可以保持並發揚和創新自身寶貴的文化傳統，為創造新的人文主義作出貢獻。一九二零年代到一九四零年代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是非常豐富的年代，他們都焦急地探尋著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包括魯迅、胡適、顧頡剛、郭沫若、梁漱溟等。現在中國已成功成為世界製造工廠，我希望，在像饒宗頤這樣的中國文化堅守者與西方學者的公開對話帶動下，中國也能成為傑出新觀念的匯聚地。

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訪問學人講座 2015 汪德邁教授主講

香港中文大學邀得汪德邁教授擔任2015年饒宗頤訪問學人，並舉行四場公開講座。四場講座話題不同，均體現汪德邁教授進行中國研究的兩個關鍵理念，即中西文化因不同的起源、發展、問題及內部機制而呈現不同特徵；兩者的差異可追溯到各自文明最初的發源。以下是講座摘要。



一、中國占卜學與西洋文化神學之比較

首場講座主要談及語言在中國文化早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汪教授首先提出分析語言的兩個維度，即溝通（言語）及知識（概念）。他認為早期中文書寫體現出知識維度的特徵，產生於占卜術，是一種與口語分離的「真正的表意系統」（表意文字在詞源意義上是指觀念、概念及書寫）。汪教授因此認為中國思想主是關聯性的，西方文明則是因果性的。中國思想的發展取決於書寫及口語的分離，以及中國文字的表意特徵。這一點在「中國胛骨占卜術」的五個發展階段中表現顯著。占卜技術的改良總是採用一種關聯關係，例如，選用龜殼作為占卜工具是出於一種象徵意義（龜殼的形狀與宇宙相關聯），而不是實用的考慮；又如在占卜中用數字取代龜殼裂縫也是因為數字的形狀與裂縫相似，而不是因為數字的數學含義。

相反地，西方文字起初是口語的符號，並慢慢從一種語標系統發展成現在的字母體系。語言在聖經傳統中被賦予創世的力量，可見口語與西方文化起源的親密關係。從這個角度比較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歐洲早期）的起源，汪教授總結道，西方文化由因果概念主導，而中國文化現象則與徵兆關係密切相關。

二、中國科學思想的特徵

汪教授在首場講座中說明中國思想建立在由占卜術衍生的關聯法上，他進一步闡述這種方法對中國認識論與科學思想的影響。汪教授認為，中國思想家嘗試通過物體的相似性來認識世界，後來的「陰陽五行結構」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從這一方面看，中國的關聯性思考方式與占卜術密不可分。

汪教授指出，「關聯性並不排斥因果性」，即中國思想家實際上也從因果關係認識世界，但僅僅用於解釋簡單的現象。當需要解決複雜的問題時，如政治和醫學，他們便回到關聯性的方法。他們認為，這些複雜的問題都無法用一種粗糙和簡單的因果論來解答。代表中國科學權威的醫學便是這種傳統世界觀的一個明證。中醫醫師更多的關注生理學，而不是解剖學，相較於器官的位置，他們對器官的功能及相互關係更加感興趣。這同樣是強調關聯性，「不僅是器官之間的關聯，還涉及身體、精神與宇宙的關係」，因此，中醫本質上是一種「宇宙—精神—身體」科學。

歐洲科學經過啟蒙運動而獲得技術的領先地位，但在此之前中國科學很可能比歐洲科學更先進。汪教授注意到，西方科學的快速發展是因為廢除了從神學繼承而來的錯誤觀念。他認為，中國的關聯性思維無疑可以豐富當代科學思考，特別是在數量物理及電腦工程方面。他希望中國科學也能清除從占卜學所繼承而來的錯誤觀念，如陰陽、五行及易經卦象。

三、我與我的老師饒宗頤

第三場講座主題為「我與我的老師饒宗頤」。汪教授分享他與恩師相處的美好回憶。旭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及旭日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主席楊釗博士捐資一千萬港元支持饒宗頤學人講座計劃。出席講座的其他嘉賓包括饒宗頤教授、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梁元生教授、饒宗頤基金饒清芬女士及支持饒宗頤訪問學人的其他代表人士。汪教授回顧他與饒公的師生情誼及朋友情誼，更帶出他與當時漢學界多位著名學者的往事。演講全文可[在此點閱](#)。





四、中國文學與藝術的特徵

第四場講座為中西藝術文學之比較。汪教授認為中西文明中的藝術及文學發展差異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及歐洲早期文字系統的不同起源與發展。中西文化都把語言看作定義與認識世界的工具，但語言在兩種文化的發展卻很不一樣。中文的發展與占卜學密切相關，而西方語言則與神學密切相關。西方的口語最初被賦予創造世界的力量，口語因此獲得舉足輕重的位置。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文，即書面文字被賦予超驗、神聖的力量，以及昭示的功能。這種觀念起源於胛骨占卜以及由此發展起來的象形文字。因此，言語創世這一概念在中國占卜文化中是不成立的。

在西方，語言被賦予創世的力量，使用語言進行創作的作家也因此被看作是自然（上帝）的模仿者。但在創作中，作者不再是自然的一部分，並創造出與自然不同的「他者」。相反，中國文學中的作者嘗試從作為自然的一部分去描述自然，保持與自然的聯繫，正像占卜術中的巫師通過技法達到與自然的溝通一樣。汪教授指出，從這個角度可以很好理解中國文學與占卜學的親緣關係，因為書寫與占卜是密不可分的。另外，「原創性」構成西方文學的必要因素，中國文學則不然。

2015年第三次「午間雅聚」

清至現代廣州地方廟宇：碑刻、空間及神祇信仰

黎志添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

黎志添教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神學院取得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目前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宋代道教黃籙齋儀、清代《道藏輯要》、廣東道教史、廣東廟宇碑刻、及香港正一及全真道教科儀。專著有《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2013）、《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2007）、《宗教研究與詮釋學》（2003）；合著有《香港道教》（2009）、《香港道堂科儀歷史與傳承》（2007）；編著有《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地方道教的變遷》（2014）、《宗教的衝突與和平》（2007）、《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2005）、《道教研究與中國宗教文化》（2003）、*Interpretation of Hope in Chinese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2002）、《道教與民間宗教》（1999）等。已發表道教學術研究論文數十多篇，刊載於多份國際著名中國研究期刊。

2015年4月10日，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活動邀得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黎志添教授擔任講者，與我們分享其新近研究成果，主題為「清至現代廣州地方廟宇：碑刻、空間及神祇信仰」。

黎志添教授首先指出，地方廟宇在中國發揮的作用不容置疑，不僅豐富民眾宗教信仰，更與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密切相關。不同於西方概念所描述的神聖空間，中國的地方廟宇體現神聖與世俗的微妙結合。黎教授認為「在傳統中國地方社會的生活裡，地方官僚和士紳雖然一方面是以社學、書院和宗廟祠堂為其儒學教化的據點，但這並不是說他們必然要廢除民間祠廟信仰——而是在與它們共生、共存和共享的實際處境之中，形成一幅豐富和多元的圖像，反映出由世俗與神聖的生活世界交差複合而形成的地方社會秩序、管理制度和公共生活」。

黎教授接著以編寫《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及籌備道教數位博物館所蒐集的材料介紹明清以來廣州廟宇的發展情況。黎教授在考察歷史悠久的廣州道教廟宇當中，常考察到廟宇中的碑刻，這些碑刻是研究廟宇歷史發展的重要資料。黎教授考察的範圍除廣州城內及城周邊地域之外，還包括南海西樵，花都，順德，東莞等地區村落的廟宇。考察發現了121座廣州府縣道教廟宇共存有282通碑刻文獻。這組282通從宋明而迄清末刻立的廟宇碑刻文，反映了廣州及其縣鄉的文化發展，其中有104通是通過實地調查、發掘出來的原碑，承載了廣州廟宇的豐富歷史。

黎教授指出，自身長時間從事道教研究，期間從道教研究轉入對地方廟宇的探究，主要緣起於對如何準確理解道教在一個區域的存在、發展和整體面貌這一問題的思考。黎教授認為「目前一些學者以全真教（龍門派）出家（住觀道士）的道觀為道教的代表，這是不準確和不適切的。因為著重出家道觀和出家道士的研究觀點，不能充分展示出道教信仰如何對民眾社會的生活和習俗發揮具滲透性和廣泛性的影響和功能」。另外的問題還包括：如何明白道教透過地方廟宇的廣泛存在，從而獲得其信仰在地方社會的有效傳播？地方廟宇與道教信仰之間存在什麼複雜的互動關係？黎教授提到一些學者在



研究傳統中國鄉村宗族與祠廟組織的關係時，常將儒家正統文化發展與該地域中神祀廟宇對立起來，把民間廟宇看作異端的淫祠，這種正統和異端的二元論一直構成一些學者用以理解和分析明清時期在廣東華南地區各鄉村里社裡所出現的儒教化、宗族化和士紳化過程的基本觀點和研究進路。然而，黎教授指出，在對廣州廟宇的研究中發現，明代中葉時期已有一些官方士紳一直是站在支持「立廟祀神」的立場上，祀神與祀民並不是對立的。聖人願意立廟祀神，因為是為民立廟。神道設教對於民安、人和的理想目標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不應把宗祠與寺廟看作對立的，而是共同發揮民安的作用。

黎教授接著通過地圖展示廣州廟宇的區域分佈情況。中國官修地方志的廣州城圖的政治屬性仍是佔據著壓倒一切的優勢地位，故城圖對城區中官衙及附屬機構標注最為詳盡，以滿足政治和軍事管理者的需求。至於對祠廟建築的標注，非常缺乏。若有，則偏重於官方祀典列入正祀的壇廟。但這一情況在道光年間有了變化。與明代和清初編修志書中的廣州城地圖的最大分別是，道光〈廣州省城全圖〉的製圖方法已經不再沿用對景法繪製，而是特別明確地繪製出城內和城郊的道路網線和街道名稱。清代道光十五年（1835）潘尚楫、鄧士憲等纂的《南海縣志》中的〈縣治附省全圖〉中對城內建築物的標注，除了有官衙和府學之外，還標示出在城內和城郊地區眾多的祠廟、道觀和佛寺。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上可以直接找到顯示名稱的祠廟總計有36座之多。所標識的寺廟不僅包括官方認可的正祀祠廟，也包括不被官方認可的所謂淫祀寺廟。

黎教授介紹，除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標注的36座廟宇之外，他通過查找其它縣志與史料，結果再檢出額外42座於道光年間存在於廣州城區的祠廟及其位置所在。即是說，道光年間廣州城區至少合共有78座祠廟。其中舊城內的祠廟數目佔了最多，有36%。西關區，佔32%；兩區合共佔68%。在清代，廣州舊城為官府重要機構所在，新城則是各地會館，銀號的集中地，因此舊城內的28座祠廟，大部分是官廟，這些廟宇中，供奉關帝的廟宇佔了很大部分，全廣州城區總計關帝廟11座，其中大部份就建在舊城內，有7座，加上其它合祀關帝的寺廟，舊城有11座祠廟是奉祀關帝，即是說舊城內約有40%的廟宇是建立在以關帝崇拜為中心的信仰傳統。黎教授指出，這種以舊城為中心區的關帝祠廟分佈面貌，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並且或可以依此來解答清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盛行關帝崇拜的原因。

另外，道光年間，廣州城區至少共有8座天后廟和7座北帝廟，二者合計起來的數量超越11座關帝廟，因此可說，清代廣州地區的崇祀天后和北帝是非常普遍的。但在此15座天后廟和北帝廟之中，卻只有1座北帝廟是位

於舊城內大北門直街，這兩類專祀水〔海〕神的祠廟的分佈趨勢較集中在新城和下西關兩片在明清以來的商業和手工業的經濟發展區。

在正祀之廟之外，道光年間在廣州城內及城郊地區卻建有很多其他奉祀不同神明的民間祠廟，據文獻資料記載，這些祠廟香火至旺，神誕報賽日，更是盛況熱鬧。對於廣東省城百姓尚多「淫祀野廟」，官修方志每多概括為「粵俗佞神」。但事實上，清代廣州城一直存在著這多麼的祠廟，民間祀神信仰盛行。黎教授認為官方正祀與民間神祠不必然經常處於截然兩立、衝突和排斥的狀態。而應該去了解在地方的具體神祀信仰中，民間廟宇的廣泛存在，實際承擔著重要的宗教文化社會角色。這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特徵，但這一歷史記憶已被淡忘。黎教授在文獻考察過程中發現，民國12年，廣州市市長孫科為了籌備經費，推動廣州新城市的發展，曾發出通告將廣州631座寺廟進行拍賣，民國12年5月29至6月20日共11次廣州市廟宇拍賣，再次可見民國初年廣州廟宇的廣泛存在，並構成廣州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民國30年，在廣州市內29個分區裡，存有至少64座傳統祠廟，大部分廟宇在短短十幾年間大量消失，可見中國現代性的急速和對傳統信仰帶來的巨大衝擊。

黎教授最後總結道，明清至十九世紀初地方廟宇成為廣州道教神明信仰傳播的主要力量。道教信仰靠賴地方廟宇更地方化、普及化及滲透化。因此，地方道教研究不能忽略地方廟宇的角色和功能。有些人類歷史學者把地方廟宇一概歸類為「民間廟宇」，以致忽略了它們與道教歷史和道教信仰在廣東傳播的密切連繫。實際上，廟宇神明信仰一直在明清以致近代在廣州地區普遍存在和得到廣泛的支持。

第二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於2015年5月7至9日於文物館東翼會議室舉行

為培養中國文化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及增強青年學者之間的互動往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自2014年起舉辦「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第二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由中國文化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合辦。論壇收到三百零五位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學者申請。經過籌備委員會的嚴格甄選，最終邀請其中二十八位學者出席會議。與會者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亞洲其它國家及歐美地區，其中三分之二與會者來自海外，體現論壇推動中國文化研究的國際性交流的主旨。與會者就中國文化研究的各個方面，如歷史、文學、宗教、藝術、思想史等發表論文及展開熱烈討論，特別在跨地區及比較視野的研究路徑上有突出表現。



第二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
Young Scholars' Forum in Chinese Studies 2015
7 - 9 May 2015



以下為兩位青年學者的與會經驗分享。

陳信恆 賓夕法尼亞大東亞語言及文明系博士候選人

我是來自香港的考古學者，非常榮幸能參與第二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廣泛研究古代及現代中國的論文課題令我受益匪淺。參與者透過各種案例研究，從中西方文學理論、宗教傳播史到新媒體與文化產業等，來概述中國研究的最新理論與方法，為中國研究打開新思維。

姜林靜 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 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德語系講師

這次青年學者論壇是我學術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步。作為一個日耳曼語學者，我一直想做大視野下的中德比較文學研究，這次宣讀的論文只是回國第一年的初步嘗試，很多地方還顯薄弱。但評論老師極仔細地閱讀了論文，提出了一針見血的點評，甚至別組的老師也給出了極有意義的建議。論壇結束後一個月我一直閱讀評論老師推薦的文獻，查漏補缺，完成了修改，這也將成為該研究日後進深的初期成果。

嶺南城市文化研究計劃系列講座（二）

城市裏的救贖：移民、階級與清末民初汕頭港口城市的善緣活動

中國文化研究所邀得蔡志祥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系主任）於2015年4月27日主講嶺南城市文化研究計劃系列講座（二），主題為〈城市裏的救贖：移民、階級與清末民初汕頭港口城市的善緣活動〉。蔡教授在講座中「以宗教性的慈善活動為切入點，一方面考察傳統鄉村的禮儀和脈絡紐帶如何在與海外有密切聯貫的新興城市中運作和根植；另一方面探討華人的海外經驗究竟促進了家鄉的現代化還是因為他們的龐大匯款加強了傳統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實踐」？

王汎森教授交流會—漢學研究新近動態

中國文化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有幸邀得王汎森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主編、臺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於2015年5月12日與中文大學中國研究領域的研究生見面交流，分享漢學研究新近動態。通過活動，青年學者得以就其學術研究興趣與王教授直接交流。



文物館第二屆「博物館專業培訓工作坊」

展覽策劃與教育

承北山堂基金贊助，文物館及藝術系合辦之第一屆「博物館專業培訓工作坊」已於2013年中旬完滿結束。透過一系列專題演講、報告討論並考察，第一屆工作坊成功吸納並培訓了十多名兩岸三地博物館專業人員。除了獲得學員一致好評外，工作坊更成就了個別參與博物館日後聯手策展，實屬難能可貴。

為促進更多博物館人員的專業培訓並發展，文物館於本年5月10日至22日舉辦第二屆「博物館專業培訓工作坊」，並再次得北山堂基金慷慨贊助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及文化政策研究所協辦。是次工作坊一共邀請十八位來自內地及港澳之博物館及藝術機構專業人員參加，包括來自首都博物館、安徽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館、香港藝術推廣辦事處、文物修復辦事處及澳門路氹歷史館之館員，陣容鼎盛。



本屆工作坊主題為「展覽策劃與教育」，一共邀得二十位本地、內地、台灣及海外博物館專家為學員作專題演講，以案例形式分享展覽策劃與發展博物館教育工作的多元經驗。課堂中，學員更有機會通過討論和小組專題報告豐富學習。工作坊更安排學員前往香港歷史博物館、文化博物館、藝術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當代藝術館及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等作實地考察，加強學員與多方同業人員之專業交流。



為期兩周的工作坊剛完滿成功，學員們都充分投入是次極具意義的培訓課程。除了反饋獲益良多，大家都慶幸能夠藉工作坊結識眾多同業朋友。有見學員反應熱烈，盼望下一屆工作坊能夠繼續得到各博物館機構的大力支持，使更多年輕館員能夠通過培訓提升個人專業知識、開拓視野，於事業領域上更上一層樓。

文物館「宜興紫砂陶藝與文化」開幕典禮及公開講座

文物館與康樂文化事務署聯合主辦的「宜興紫砂陶藝與文化」展覽於4月10日(星期五)舉行開幕典禮。應邀蒞臨的主禮嘉賓有：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執行主席羅友禮先生、北山堂基金主席利乾先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吳志華博士、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譚美兒小姐、中大文物館館長蘇芳淑教授、中大文物館諮詢委員會主席莫華釗先生，以及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梁元生教授。

繼沈祖堯教授和吳志華署長致辭之後，策展人謝瑞華女士及黎淑儀女士簡介展覽精粹，又有蔡寶瓊教授主唱「茶山情歌」，蘇思棣先生笛子伴奏，別開生面。是日嘉賓滿座，樂也融融。



主禮嘉賓為「宜興紫砂陶藝與文化」展覽剪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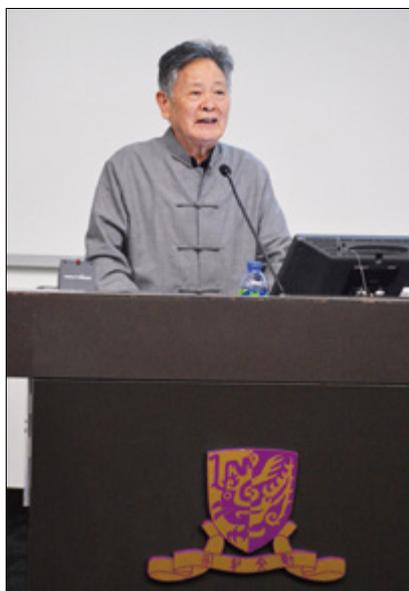


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致辭，讚譽兩大藏品合展，有如倚天屠龍，刀劍合璧



中大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蔡寶瓊教授唱歌，德謔琴社社長蘇思棟先生笛子伴奏

配合「宜興紫砂陶藝與文化」展覽，文物館於4月11日舉辦「宜興紫砂陶藝與文化」公開講座。近三百位紫砂愛好者參與，盛況熱烈空前。六位講者包括來自國內的徐秀棠先生、徐立先生和高振宇先生，台灣的黃健亮先生，以及本地的鄧民亮博士和黎淑儀女士。各位講者精彩分享，參與者獲益良多。



著名宜興陶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徐秀棠先生主講



鄧民亮博士

文物館「萬象神采」講座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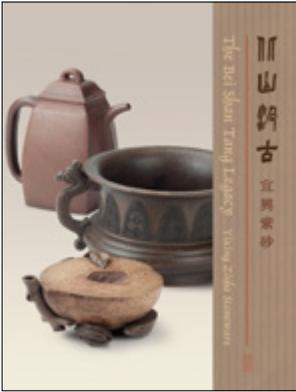
「萬象神采」講座系列第三講及第四講分別於2015年3月28日及5月9日舉行。第三講的主題是「中國藝術的『傳統』與『創新』」，講者為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管偉邦教授，管教授亦即場示範寫意花卉創作，供參加者觀摩學習。第四講邀得京都國立博物館研究員吳孟晉博士專程來港介紹中國近現代繪畫於日本的情況，並請來文物館及藝術系訪問學人嵯若昕教授分享她在摩耶精舍擔任張大千秘書的經歷。



文物館「萬象神采」午間藝聚系列



文物館於一月至五月期間與音樂系合辦「萬象神采」午間藝聚系列，共舉行了十次的專題導賞及音樂表演，主題分別為：「嶺南畫派」、「南張北溥」、「南北二石」、「金陵新韻」及「海上畫壇」。導賞部分由文物館助理研究主任陳冠男博士主持，加上音樂系同學精彩的演奏，吸引了不少校內人士參加。



文物館《北山汲古：宜興紫砂》

《北山汲古：宜興紫砂》由黎淑儀、謝瑞華編著，2015年出版。

文物館承蒙北山堂惠贈宜興紫砂陶器的藏品著錄。藏品內容豐富，包括茶壺、博古、文玩及像生等不同類型的紫砂製作，共一百六十八項；年代跨度由十八至二十世紀，以二十世紀前期仿古紫砂為主。全部藏品彩版精印連中英文說明。兩位作者各撰專題論文，綜論館藏紫砂陶器及近代仿古紫砂，聚焦明清以來紫砂陶器的「文人藝術」及「真仿混淆」的風格特色，並探索二十世紀前期上海仿古紫砂之各方參與及文化內涵。

訂購請聯絡文物館。

http://www.cuhk.edu.hk/ics/amm/form/appform_publication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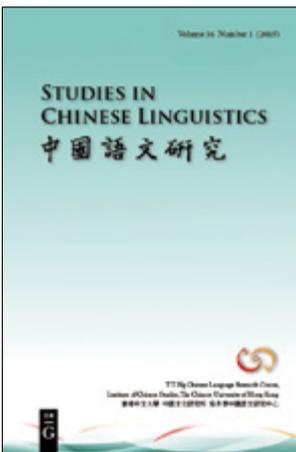


文物館《宜興紫砂陶藝與文化》

由黎淑儀、謝瑞華編著，2015年出版，是為配合《宜興紫砂陶藝與文化》展覽而出版的小冊子。展覽由茶具文物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聯合籌劃，匯集兩館珍藏，全面展示及探討宜興紫砂陶器的工藝成就與發展，及其所反映的文化要義與社會影響等。展品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北山堂藏品一百六十八項及茶具文物館羅桂祥藏品五十項，共二百一十八項。是書精選二十六項展品，圖文並茂，介紹宜興茶壺的文化與鑑賞：供春壺的故事；紫砂壺獨領風騷；曼生壺及其流風；孟臣壺與工夫茶；清末民初的名工雅製；現代壺藝承傳；外銷紫砂及影響。並介紹茶文化以外的紫砂製作，包括博古、文玩及像生。

訂購請聯絡文物館。

http://www.cuhk.edu.hk/ics/amm/form/appform_publications.html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中國語文研究》

《中國語文研究》第36卷第1期已經出版。本期刊載三篇英文文章：

1. Richard S. Kayne: *Once* 和 *Twice*
2. 廖偉聞：消失的“時間”：談漢語的計次詞組
3. 郭珮蓉：漢語動詞重複句中側邊移動之構成要素

今期是首次由De Gruyter Open以開放取用形式發行，文章可從De Gruyter Open網頁免費下載：<http://www.degruyter.com/view/lj/scl>.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二十一世紀》

《二十一世紀》2015年4月號，第148期已出版。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之主題為「神州法治憂思」，內刊周大偉教授文章〈新中國「依法治國」理念的弔詭和嬗變〉。

《二十一世紀》2015年6月號，第149期。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之主題為「中國大轉型的社會學思考」，內刊郭于華教授文章〈解釋共產主義文明及其轉型——轉型社會學論綱〉，文章從轉型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探索共產主義文明及其轉型的研究價值。

詳細目錄請見《二十一世紀》網站：<http://www.cuhk.edu.hk/ics/21c/>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董浩雲與中國遠洋航運》

由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與中華書局合作出版之《董浩雲與中國遠洋航運》於2015年5月出版。此書屬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之「商業/文化/社區：香港企業家傳記系列」研究計劃叢書第二本，作者為本中心名譽高級研究員鄭會欣教授。

鄭教授數年前曾負責編注董浩雲上百萬字的日記，在此基礎上，他結合董氏後人提供的董浩雲生前保存的大量文件資料，以及各地檔案館保存與董氏有關的資料，並走訪董氏親屬與故舊，從而撰寫出一本全面翔實的董浩雲傳記。

本書不只將董浩雲簡單地視為一個成功的商人，而是把他與整個國家的強大、現代遠洋航運事業的發展聯繫在一起，本書書名定為《董浩雲與中國遠洋航運》，就是希望讀者通過董浩雲傳奇的一生，了解中國現代航運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了解董浩雲為代表的老一輩企業家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所作出的奮鬥與奉獻。

訂購請聯絡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莊荀考論》

由何志華教授撰著、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出版之《漢達古籍研究叢書》第三十六種《莊荀考論》，已於2015年5月出版。歷來學者皆以荀況既稱戰國儒家思想代表，因與道家莊周思想迥異，荀子甚或刻意貶抑莊子論說，儒道兩家壁壘分明。本書作者通過比對《莊》、《荀》兩書措辭用字，發現兩書關係密切，荀子每多採信《莊子》論說，此與前人論斷大相逕庭，因將相關論文結集付梓，望能為《莊》、《荀》兩書淵源，提供新證，並就《莊》、《荀》部分文本問題，提出新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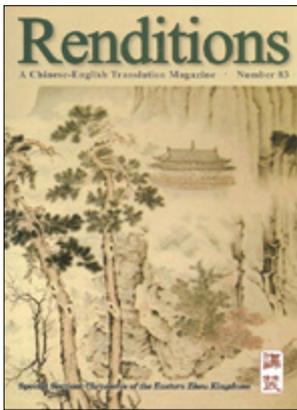
訂購請聯絡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或中文大學出版社。



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古籍傳注異文訓詁集證》

由何志華教授及林麗玲博士撰著、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出版之《漢達古籍研究叢書》第三十七種《古籍傳注異文訓詁集證》，已於2015年6月出版。該書輯錄古籍傳注，旁參群書，輔以相關出土文獻，比對古書異文及其注解，探求漢代以來古籍傳注諸家，包括毛公、鄭玄、高誘、王逸、偽孔安國、韋昭、王肅、王弼、裴駙、張湛、盧辯、郭象、成玄英、楊倞、司馬貞、張守節、顏師古等之典籍傳注，分析此等注解訓詁與古書異文之關係，望能有助學術界了解漢代以來學者注解古籍時之習用方法，以及注家理解文義時可有考慮相關「異文」。

訂購請聯絡[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或中文大學出版社。



翻譯研究中心《譯叢》(2015年春季)

見英文版本

其他出版文章

許曉東(文物館)

〈扳指的前世今生〉，《國學新視野》2015年6月夏季號，總第18期，頁151-155,7。

陳冠男(文物館)

〈萬象神采的近現代中國畫壇及高奇峰《孔雀》〉，《典藏·古美術》，總第272期(2015年5月)，頁174-179。

嵇若昕(文物館)

〈社會生活史與鑑玉：以玉駱駝與哪吒降龍珮為例〉，《喜聞過齋圖錄》(書名暫訂)

劉艷(文物館)

“Illuminating Han society,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mid-Yangzi region,” in *Interdisciplinary in Archaeology*, Oxfor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 forthcoming, 2015.

Yan Liu and Jing Zhang, Chinese translation, Jessica Rawson. “Ordering the Exotic: Ritual Practices in the Late Western and Early Eastern Zhou”, *Early China* vol.2, Beijing: Wenwu Chubanshe, forthcoming, 2015.

翻譯研究中心「閱讀中國翻譯史：第四屆中國翻譯史研究暑期班(2015)」

翻譯研究中心主辦、湖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協辦的「閱讀中國翻譯史：第四屆中國翻譯史研究暑期班」將於2015年6月29日至7月4日在湖南省湘潭市湖南科技大學舉行。

本屆暑期班反響熱烈，共收到申請七十九份，其中有三十位申請者入圍，成為正式學員。

暑期班邀請了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胡志德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教授、日本關西大學沈國威教授、復旦大學鄒振環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王宏志教授五位知名學者主講，將用高屋建瓴的學術眼光為從事翻譯史研究的青年學者們講解研究方法及路向。



文物館「宜興紫砂陶藝與文化」展覽

展覽由文物館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聯合主辦、文物館與茶具文物館聯合籌劃。展覽匯集兩館珍藏，全面展示及探討宜興紫砂陶器的工藝成就與發展，及其所反映的文化要義與社會影響等。展品為文物館北山堂藏品一百六十八項及茶具文物館羅桂祥藏品五十項，共二百一十八項。展覽內容分為兩大主題。第一主題是宜興茶壺的文化內涵與鑑賞，分為七個副題：供春壺的故事；紫砂壺獨領風騷；曼生壺及其流風；孟臣壺與工夫茶；清末民初的名工雅製；現代壺藝承傳；外銷紫砂及影響。第二主題是茶文化以外的紫砂製作，包括博古陳設、文房雅玩及像生雕塑等。精選展品如下：



**時大彬款
開光方壺**
20世紀前期
高11厘米、長13.5厘米
北山堂惠贈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995.0213



**瞿應紹、喬重禧
石瓢壺**
19世紀前期
高7厘米、長15.7厘米
北山堂惠贈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983.0022



**梨形小壺
“玉香齋”刻款**
耿特莫森號沉船出水
約1750年
羅桂祥藏品
茶具文物館
C1986.0054



荷蘭貼花方壺
18世紀初期
羅桂祥藏品
茶具文物館
C1981.0481
1995.0213



徐友泉款
太平有象水注
20 世紀前期
高11.4厘米、長13厘米
北山堂惠贈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995.0314



陳鳴遠
蓮瓣勺
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
長10厘米
北山堂惠贈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995.0238

為配合展覽，文物館特別出版展覽同名小冊子，精選二十六項展品，簡介展覽精粹。又同時推出文物館藏品圖錄之「北山汲古：宜興紫砂」，收錄兩篇專文及一百六十八件展品說明，詳盡介紹館藏北山堂捐贈宜興紫砂陶器的特色。兩書均中英對照，圖文並茂。

「宜興紫砂陶藝與文化」展覽詳情如下：

日期：2015年4月11日至10月4日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II及IV

文物館開放時間：星期一、二、三、五及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四休館

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

中國文化研究所為中國文化研究學者提供定期及持續的交流機會，於學期間每月舉行「午間雅聚」，活動備有午膳招待、短講及分享環節，詳情如下：

日期	講者	講題
2015年9月21日 (星期一)	何碧琪博士 文物館副研究員	解碼「黑老虎」：中大文物館藏碑帖菁華揭祕
2015年10月26日 (星期一)	姚進莊教授 文物館副館長	待 定
2015年11月30日 (星期一)	馮勝利教授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待 定

「午間雅聚」於下午12時30分至2時在文物館東翼二樓活動室舉行。有關詳情，請瀏覽[中國文化研究所](#)網頁。

編輯委員會

主 編：黎志添

成 員：徐艷蓮 梁子煒 李潔兒